

第五章

國共內戰 及大陸淪陷

第1節 感慨憶神州

國共內戰，在中國近代史上應該是最黑暗的一頁。八年對日抗戰已使國弱民窮；百姓還沒有喘息機會時，卻又流離失所。在國共雙方，損耗已經極大，而無辜老百姓更無緣無故地付出了慘重的代價，且所付出的只是白費而已。

由此可知，治國之道何其重要。而當政者的愚拙偏私，視人命為芻狗，更令人憤慨！

二十年前，沈君山教授曾問我對丟掉大陸的看法，我毫不猶豫地回答：「據我看來，大陸是我們自己丟掉的，而不是共軍贏來的！」我親眼目睹勝利還都之後，高級幹部大發接收財，奢侈荒淫，將驕兵逸。我在東北地區，到處看到百姓身穿美製軍服，那都是從軍中偷出來的。從這一件事上就可看出，國軍雖有飛機大砲，裝備上佔有絕對優勢，但紀律敗壞、軍無鬥志，導致短短四年中，就把整個大陸拱手讓人，送掉了大好江山。

今天在台灣，見過很多將領，胸前掛滿排排勳標，趾高氣揚，高談闊論，竟無一點戰敗失土的羞恥之心，實在為他們這輩人難過。

第2節 運兵與空投

內戰期間，我大隊的主要任務是「運兵」與「空投」，有時將運輸機當轟炸機用，支援地面部隊作戰。

當時運兵最多的一次，是1946年由山西省的運城，運送三千餘步兵至陝西省的榆林。在接奉命令後，即派所屬一〇三中隊中隊長周伯源，率領十架C-46機以及必要的機務人員，攜同零件器材出發到運城；前後十多天，把所有部隊和裝備全部運達榆林。而且上百架次的任務中，連一點小毛病都未發生。只是兩地機場塵土很大，等到任務完畢回返基地時，所有的飛機和人員，全已「灰頭土臉」，狀極狼狽。

我大隊每次執行任務，多能圓滿達成。只有在長春運兵一役中，共動用C-47機約十架，歷時半個多月，其間不幸發生阮堅煜等駕駛的兩架飛機相撞事件。

國共對決，東北是必爭的關鍵。1948年間，國軍苦守著長春、瀋陽和錦州三地，蔣總統對這三個城市極為重視，我也常載老先生親臨前線督戰。

後來長春被共軍包圍達一年之久，守軍是「剿總」副總司令鄭洞國將軍的新軍，這一支部隊在印度訓練，全部配備美式武器，原是抗戰末期，準備反攻對抗日軍的，戰力很強，但不知為何不能突圍。而被圍既久，城內缺糧，甚至門窗等可燃之物都拆下當柴燒。我大隊C-46機空投糧食和彈藥，出動架次不計其數。

據說鄭洞國是蔣總統的一員愛將，在長春最危急之時，有一天我到空軍北平指揮所去，探望同學蔡名永和譚德鑫兩人。他們說正奉令做參謀研究如何「營救鄭洞國」，並稱已獲結論。這一個問題的起源，是在某次

空軍演習時，蔣總統看到飛機低飛鉤起通訊袋（約半磅重）的表演節目，就命王叔銘副總司令研究，能否派飛機到長春把鄭洞國鉤救出來。王副總當即下令蔡、譚兩人做參謀研究。他倆奉命認真作業，計算一個人的體重（估計一百四十磅），在飛機低速飛行時的衝擊力和人體的承受力，又需要多粗的繩索才不致斷折等等。那時候還沒有直升機掛鉤吊人的技術。倘用飛機吊人，即或都能夠做到，想想看鄭將軍在寒風中被吊在空中，經約兩小時的飛行，才可達最近的瀋陽基地，等到飛抵時，恐怕他已成「風乾火腿」了。這實在是一件可笑的事，但上級居然命令下屬做參謀研究，這可算是國共戰爭中的一頁荒唐史吧！

10月15日，我大隊奉命空投兩封「重要手諭」，一封給錦州范漢傑，一封給長春鄭洞國，當時蔣委員長已知局勢不可為，手諭命令突圍棄城。但手諭下得太慢了，當夜錦州就失守，四天後，長春也告淪陷。

至此，東北只剩下瀋陽。我大隊不斷對瀋陽進行空投，蔣總統對這最後一個據點極為重視。我曾親自押著一飛機的金元券到瀋陽，一下飛機，就碰到名軍事記者劉毅夫先生；他帶我到勵志社，一進去烏煙瘴氣，滿室高級將領在打梭哈，桌上擺滿了金元券，他們三元、五元地下注，那時三元金元券就可擺一桌酒席。另外更糟的是，我們把金元券運到瀋陽後，好多次又要我們原機把它運到上海，說是採購補給之用。其對金融之擾亂，非筆墨可形容。

走在瀋陽街上，到處都看到有人在賣軍人裝備，我當時看得極為心痛。守瀋陽的廖耀湘兵團，全部是美式機械化部隊，是精銳中的精銳，而軍紀卻蕩然若此，可見大勢已去！

在這裡我要談一談金元券的故事：1948年，王雲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，因鑒於國家內戰方殷，軍事失利，經濟衰疲，物價波動，法幣已失信用。所以另把黃金為基準，發行新的通貨——金元券，來代替法幣，希望藉此穩定經濟，挽救危局。發行之初，一般人民對它還存著信心，紛紛拿出自己積存的老法幣、外幣，甚至金飾等，兌換新鈔票。我們隊上也鼓勵大家去兌換金元券。不料時局越來越壞，經濟越來越糟，物價一漲再漲；尤其在蔣經國上海打老虎失敗以後，局勢日益惡劣，金元券每天貶值，甚至一天幾個變動。以致民不聊生，人心盡失。

我們大隊當時運送補給物資，曾將福利社所盈餘的錢存入銀行。可是金元券急遽貶值，我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，把銀行存款全數取出換回黃金。同時也勸隊上人員立刻停止將自己手中的金子等實物，去兌換金元券。我預料不久這張新鈔票將會成廢紙。後來不幸言中，結局果真如此。這是國民政府在經濟上的一大敗筆。

1948年10月18日，我最後一次載老先生飛瀋陽，老先生將守軍高級將領都召來飛機上開會，也就在飛機上吃炒飯。十五天之後，瀋陽便失守了。

東北之敗，是國共戰爭逆轉的關鍵。我大隊的飛機在東北上空飛來飛去，不下百架次。我C-46機奉令在戰區偵察，只見遍地的國軍，被共軍騎兵趕得滿山遍野地亂竄，狀至悲慘。飛行員回來報告，都稱不忍卒睹。我們雖已盡心盡職，卻目睹敗局，而無能為力。

國共戰事延伸到關內以後，河北省的永年地區首被包圍，我們對永年的空投任務，前後歷時三年；多數是裝滿了成袋的饅頭去空投，統計總共出動了一千零七十七架次，投下糧彈十四萬四千八百八十五公斤。創下了對單一城市空投的最高記錄！

東北撤守後，我一部分空運機和戰鬥機駐防北平南苑機場，由一期老大哥吳國棟出任司令官。共軍逐漸逼近後，我們每次派一架戰鬥機飛到附近偵察，約定如見敵軍接近機場時，飛回機場上空就搖搖機翼，要大家警覺。有一天我偵察機回場時天色已暗，還沒有看清楚他有沒有搖擺機翼，吳司令卻令所有戰鬥機和空運機全數起飛，飛往天津及其他基地疏散。其實機場附近根本無共軍蹤影，此時戰區總司令傅作義正到機場視察空軍備戰情形，不料飛機都已飛跑，他非常氣憤地掉頭就走。

在徐蚌會戰中，國軍於徐州蚌埠和雙堆集戰敗以後，精銳部隊喪失殆盡，共軍乘勝推進到長江北岸。蔣總統在1949年1月21日正式宣告下野。

在這歷史性的一天，我飛「中美號」專機，載著老先生從明故宮機場起飛。我們在首都上空盤旋了一圈，

臨別依依，倍感不捨。而這座名城也將黯然引退，將主角的光芒還給北京了。

老先生的最後希望是在淞滬，他希望堅守上海這個國際都市，以守待變。1949年5月12日上海保衛戰開打，指揮官是湯恩伯將軍。

有一天，我奉命攜帶老先生的親筆信飛去上海，親交湯恩伯。到後經人引領，進入一處深宅大院，在最裡面的一間大廳中，煙霧瀰漫，醇酒美女，一屋子的高級軍官正在跳舞；我看在眼裡，痛在心裡，我把信件交到，就匆匆離去。

回到江灣機場後，我大隊便緊急疏運空軍供應司令部的人員和器材。但有一件事甚為不解：就是在此緊張時期，卻還有大批飛機用的發動機從美國運來上海。後來我又發現庫房中仍有很多貴重器材零件，沒有按照命令裝運赴台；經查出管理倉庫的一個中尉軍官，原來是共產黨員，滲透到軍中來，留置器材零件，專等共軍接收的。該員當即押到警備司令部去處理。

我們正忙著疏運物資之時，蔡名永同學特地跑來機場，告訴大家：「陸軍都已撤退了，你們怎麼還不走？」那時蔡是駐湯部的空軍連絡官。我們機場的指揮官是毛瀛初將軍，他奉令留守江灣；規定在敵軍砲火未打進機場前，我機不准撤退。

我們在機場，原已聽到隆隆砲火聲，判斷敵軍還遠。可是後來遠方的砲火突然平息了，一個多小時不聞

動靜；剎那間一枚砲彈打進了機場，才曉得共軍已經悄悄地掩到江灣機場了。我們在千鈞一髮之際，奉令緊急起飛，全場幾十架C-46，幾乎同一個時候起飛升空。所幸慌中不亂，沒有衝撞。

空運隊幾乎參與了大陸上所有各次的撤退行動。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桂林的撤退，司令官羅之綱（羅機）將軍沉著穩健，撤軍有條不紊。搬不走的點火燒掉，毫不見亂軍景象。其他地區則多半是慘和亂，不忍卒睹。

第3節 轟炸任務

除了運兵和空投，空運大隊還將運輸機作為轟炸機用，直接參加作戰，包括投彈和對地攻擊等。舉例而言，1947年5月的四平戰役中，擔任夜間偵炸任務，所屬人員不眠不休，出動百多架次，空投炸彈估計在百噸以上。1948年6月的南陽轟炸，用C-47機投擲炸彈，轟炸圍城共軍，據當時負責出任務的飛行員潘作樑回憶：此任務分兩架次；黃昏至午夜，午夜至黎明；其目標是擾亂南陽敵軍在夜間挖溝，進行圍城。操作法是把C-47機門打開，在登機處置一鋼板，兩名軍士把炸彈滾上鋼板各站一邊，看信號將鋼板後端掀起使炸彈滾下。駕駛員在戰場上空轉圈，當發現地面有燈光，或部隊可能有動態時，即按信號燈投彈一枚。動態靜止後，再繼續圍繞偵察（C-47投炸彈，史冊上還沒有此紀錄）。

同年7月又以C-47機投迫擊砲彈（Mortar），炸射晉原共軍。操作方法是滿載迫擊砲彈，與投炸彈方法相同，在戰場上空發現有敵軍前進時，即按信號燈投迫擊砲彈一盒；彈落時有若天女散花，直至投盡；迄天色將暮，才返回基地。在C-47史中，空投迫擊砲彈，亦首開紀錄。

還有湖北隨縣（王秉琳執行）和河南鄭州（郁文蔚執行）的投彈任務，也都圓滿達成。

1948年11月6日，以徐州為中心，東起海州，西到商丘，北接臨城，南達淮河，國共展開了生死對決的徐蚌會戰。

我大隊在大戰期間，擔任空投任務，但是天候不佳，能見度不足，阻礙了空投。11月底第七兵團被殲，黃伯韜負傷自戕；接著第十二兵團也失去，司令黃維被俘；只剩下杜聿明兵團和胡璉、孫元良等部隊。

12月7日周至柔總司令找我去空軍總部，交代務必送三千套防毒面具給在陳官庄的邱清泉部隊，幫助國軍突圍。

此項任務按規定輪由潘作樑出任，後來他曾回憶這段驚險過程：「我自明故宮起飛，按命令於黃昏降落徐州，機場僅有站長一人，當晚在站長室稍事休息。站長稱人已跑光，無法擺跑道燈，不可能夜間起飛。我謂無妨，明晨再說。18日晨黎明前四十分鐘，請站長駕唯一的日式卡車直駛跑道底端，轉頭面對飛機，開亮車燈。

目的有二：一是沿跑道直行，可察覺是否有障礙或埋伏，二是我機可對準汽車燈做短場起飛。升空後，於黎明到達陳官庄，可隱約看見田地中臨時壓出的一條跑道。時民航機正在空投大餅，當即通話聯絡，請稍停空投，等我落地起飛後再繼續投，同時呼叫驅逐機掩護。落地後，即有亂砲打來，無法停機卸貨；只有邊滑行邊由葉副駕駛到後艙協助軍士，將防毒面具推出機艙。同時在地面不做正規滑行，以免給敵人有瞄準機會。

「當時邱兵團參謀長和空總董明德副署長乘坐吉普車來到機邊，我請他們在跑道頭等候，滑到跑道頭時，機艙已清。稍停，讓他們登機後，立即做短場起飛脫離火網，逕返明故宮。降落後發現尾部升降舵曾中彈。」

這項任務只有九死一生的機會，接獲命令時，我向周總司令陳情，說此項任務之不可行，即或達成，也只有三千人可防毒氣，其餘十餘萬人如何交代？處理不當，會出亂子。但周將軍說：「上頭命令，無可奈何。當我下達此令給作樑時，簡直好像叫一位親愛的戰友去送死！萬幸，他達成任務回來了，全隊欣慶，我也深深感謝上蒼。」哪想到之後又奉命第二次做同樣任務，這次輪到中隊長林冠群，他同樣也完成使命，這真是萬幸！

這四年中，還有印象很深的兩件事：一是我隊負責瀋陽大撤退。當初東北「剿總」總司令是衛立煌。據烏鉞告訴我，瀋陽失守前，衛立煌和參謀長趙家驥率先跳

上烏鉞的飛機，本來只能坐五十人的飛機，一下子跳上了六、七十人，坐不上飛機的就抱緊機輪不准飛。景象之狼狽，戰爭之殘酷，全在這裡上演。

另有一次，我大隊最後一架飛機離開南京之時，明故宮機場尚有一架美國的C-47停在場中，那是配屬美國駐華大使館的。而我們在空中，則可見到共軍正由下關源源進入南京。在那新落成的空軍新生社附近，竟有一長列的老百姓，正搬運新生社遺留下來的家具。生死瞬間，還在發國難財。

戰爭的殘酷，將人性赤裸裸的解剖；在這四年潰敗期間，人心傾圮，綱紀崩頹。在亂世最能清晰感受到善惡忠奸，看盡人生百態。

第4節 進駐嘉義

1948年1月，「空運第一大隊」奉命更改番號為「空軍第十大隊」。這一年中，由於美軍和國共雙方合組的「軍事調處執行部」調解工作失敗，大陸多數地區都告淪陷。到年底平津戰況告急，政府遂決定逐步遷來台灣。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明確的表示：「空軍準備全部撤到台灣，希望官兵行動一致，但不勉強大家。如不願赴台者，由空總發給旅費，幫他回歸鄉里。」結果，空軍相當完整地轉移到台灣來，對台灣防衛軍力，大為增強；特別是高砲部隊，移駐台灣後，曾有一段時

間，蔚為海岸防禦的主力。

在南京時，周總司令曾對我說過一句「名言」，他說：「抗日靠山，反共靠水」。

我們撤到台灣，應是最正確的決定，卻沒料到在台灣一住就是五十多年。大家來台時，都認為這是臨時的、暫時的，不久就可回到大陸；因此初到台灣時，一切均取臨時措施，名之為「克難」。現在回想起來，似乎相當離譜。

空軍在台灣光復以後，已在台設有幾個單位，但人數很少。我們大隊在得知將遷台灣時，即選派一個小組，由副大隊長楊道古率領，來台尋覓基地。小組選定了嘉義，我們就陸續搬運，到1949年完成全部進駐工作：計一〇一、一〇二和一〇三等三個中隊駐守嘉義，一〇四中隊和專機組（後於1954年7月起改稱專機中隊）則駐台北的松山基地。

後來空總決定將第四大隊也移駐嘉義，因此嘉義基地就有空運機和戰鬥機兩個大隊駐防。第四大隊大隊長先是張光蘊，繼為徐華江，我則被任命為嘉義空軍基地的指揮官。實際上兩個大隊是各自獨立的，作戰等有關任務則由空軍總部直接指揮，而地面勤務多由十大隊和四大隊協同辦理。

我們進駐嘉義時，機場上的建築物，大都被美軍飛機在二次大戰時炸毀了；九座飛機棚廠都破爛不堪，營房多數也都沒有屋頂。我們的隊員和家眷共有八、

九千人，陸續到達後，除少數人分住城裡各大小旅館外，其餘都在機場無頂的棚廠中，以報紙隔間，以稻草打地鋪暫時安頓。幸虧嘉義地區冬天雨少，減少了生活上許多困窘。

嘉義城內原有白川町和東門町兩處日軍留下的眷舍，白川町已被當地老百姓佔住，而東門町則為陸軍使用。我們向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將軍交涉，他慨允移出所住的陸軍人員，我們就把四大隊的眷屬遷住東門町。但白川町的情況卻又不一樣，因為其中住的百姓較多，討回不易。於是我們邀請一些住在白川町的長者，來到基地參觀。他們看到我大隊的眷屬，老少婦幼都住在露天無頂棚廠的窘狀時，也覺得過意不去，於是自動自發地搬出白川町，把房子無條件地讓給我們。十大隊立即動工，把那些破舊的日式房屋加以整修，並發動勞動服務，在白川町的空地上，用竹子和泥巴蓋起兩百間眷舍來。這樣，住在機場的眷屬便全部搬進「新居」了。

我們撤離南京之時，曾利用空運機空餘的噸位，搬運不少講究的家具。那是剛開幕不久的「空軍新生社」的摩登沙發和紅木桌椅等。又承衛生署劉瑞恆署長把醫院搬不走的病床和大量DDT藥劑，贈送給大隊，我們把它們統統運到嘉義。因此，大大地充實了基地的官兵俱樂部；同時也成立了一間當時頗夠水準的醫療所。徐立強醫官乃得大展所長，發揮了很大的醫療保健功能。

嘉義基地初步整頓以後，我們又次第擴修跑道、修

復棚廠，以應飛行任務和地面修護之需。又設立了福利餐廳，為官兵免費供應午餐。更創設了子弟學校，使官兵的孩子有書可念，無後顧之憂。又興辦一座廣播電台，除為當地軍民宣導政令和報告新聞外，也做些對大陸的心戰工作。

講到子弟學校，當時的校長是周人鏡老師，她做事認真，教學也有經驗，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；今天很多該校畢業的子弟，多有成就，在國內外嶄露頭角。後來周校長被聘到台北一女中教書，也頗富令譽。其後她與我第十大隊尹世銳結婚，兩夫婦創辦了大誠中學，造就不少人才。人鏡不幸於1993年患病去世，大家同感悲痛。

另外，我們和鐵路局交涉，把通往基地的鐵路修復，以便基地人員的往返，以及飛機燃料和給養輜重的運補。當時大局尚不穩定，共軍從未放棄所謂「解放台灣」，甚至「血洗台灣」的叫囂。我們為了預防戰火蔓延至台島西岸，一旦退守山地時，需要當地各項支援，所以也曾派人與山胞連絡。不僅如此，我們與嘉義地區政府和人民都建立起良好的關係，彼此相處融洽。同時也由於空軍是嘉義最高的軍事單位，是中央政府所屬的最大機構，當地遇有糾紛時，還常請求我們出來調處。例如當時的議長林君，就曾懇求准他到我家來躲避，據說有人要害他。諸如此類的事，我們都盡一切可能，幫助他們把事情擺平。為此嘉義市政府還酬謝我為「榮譽市民」（榮譽市民證第二號），我也就從此成了合

法的「嘉義人」。

嘉義市政府的榮譽市民證第一號是頒給翁文灝先生的。他從行政院長辭卸後曾閒居嘉義，住在中國石油公司的一處招待所裡，最後回去了大陸。翁先生是我國有名的地質學家，曾與丁文江合製第一本中國地質人文地圖，在抗戰以前出版，當時是我國最完整的一本地圖，並為我空軍所採用，作為航行參考之用。他的女兒翁嬋娟是瑛華的「南開」同學，我們有時也去拜會。翁先生和我閒談之中，很含蓄地表示為官之難；其難處之一，是政府沒章法，他說：「上頭經常下條子給我，使我不知所措。」此話出自一位前任行政院長之口，實在值得玩味，也頗令人感慨！

嘉義基地經過同仁們同心協力，努力建設，終於粗具規模；而且無論在人員士氣、待遇、福利及環境等方面，都展現了一番新的氣象。